

一切經音義

三種校本合刊

辛弘林

徐時儀 校注

畢慧玉

耿銘

郎晶晶

王華權

徐長穎

許啓峰

助校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擢雖勅於反

也 亦 殊 雙 金 分
 復 猶 變 雷 分

法藏 P2901 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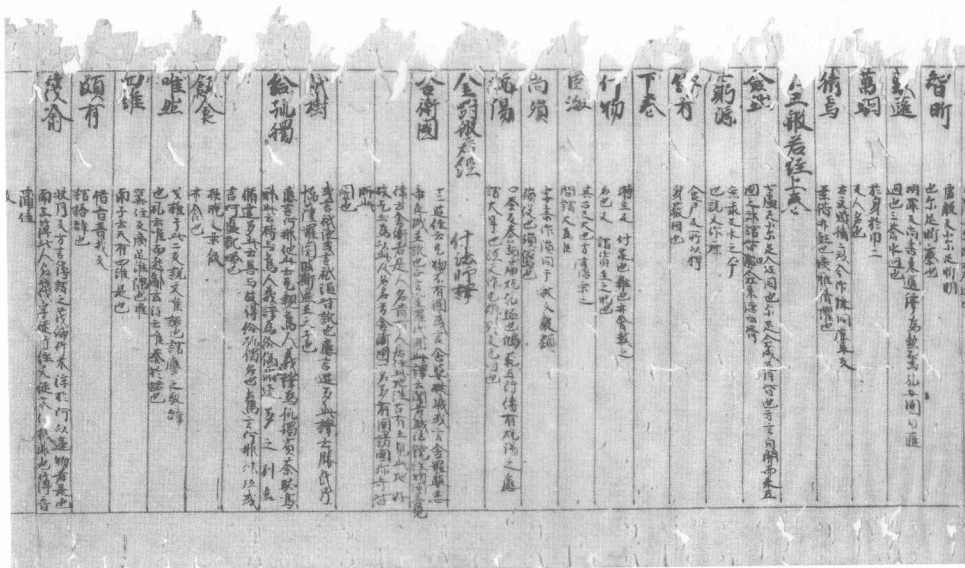
阿摩尼寶經同秩 阿耨達龍王經二卷共大方廣寶
 德女共无垢施菩薩分別莊嚴經同秩 大方廣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般涅槃經
 第一卷
 壽命觀柳及衆壽亦即命也壽取
 名命取人之生分

剛力士經五卷共大集賢護經同秩 今小
 菩薩同秩 虛空菩薩同樂福經
 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妙藏經二卷 寶
 自因緣經同秩 法界體性天分別經二卷
 經同秩 善解菩薩二卷亦同秩 寶梁經二卷共決定
 經 虛空菩薩經八卷 聖善住意夫分別經三卷
 小經同秩 大方方便經三卷 大寶續經二卷共

俄藏 Дх 00965 玄應《一切經音義》

一切經音義卷第四	翻經沙門玄應 撰
菩薩見寶三昧經	闍切經
藥手經	大灌頂經
菩薩鐶絡經	佛名經
月燈三昧經	十住斷結經
觀佛三昧經	五千五百佛名經
大方廣十輪經	大方便報恩經
寶雲經	金光明經
大雲經	蜜迦金剛力士經
菩薩胎藏經	大集賢護菩薩經
大方等陀羅尼經	
菩薩見寶三昧經	
第一卷	
廣平又作應同於教及蒼頡篇玄乳士	
骨也說文廣句也漢書壽昭曰句	
四面高中失下曰膺	
原濕又作陷同詞丘及介下下濕曰濕	
阻墊也	
寶礦古文碑字書作礦同礦極及說文	
礦銅鐵礦也經文純金作鉢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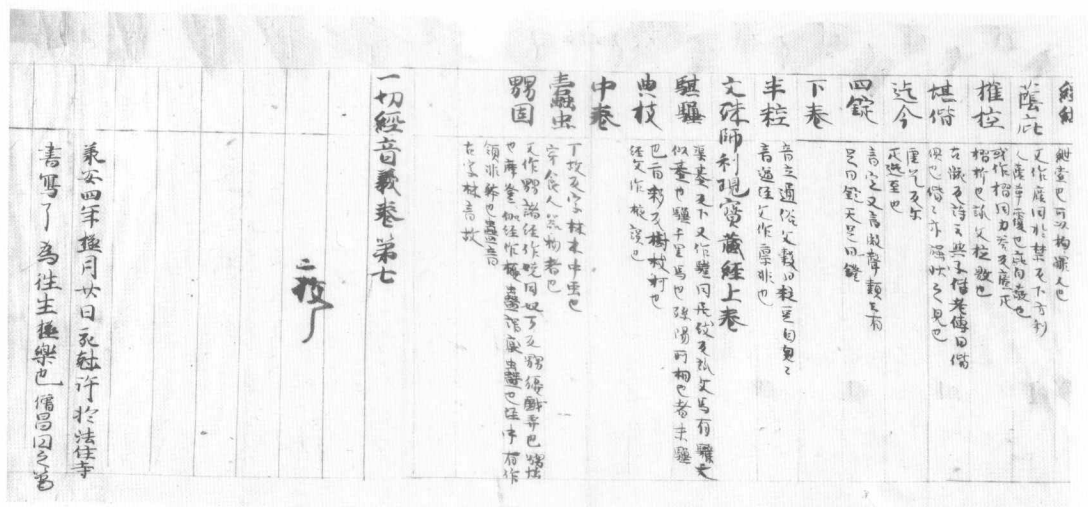
七寺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西方寺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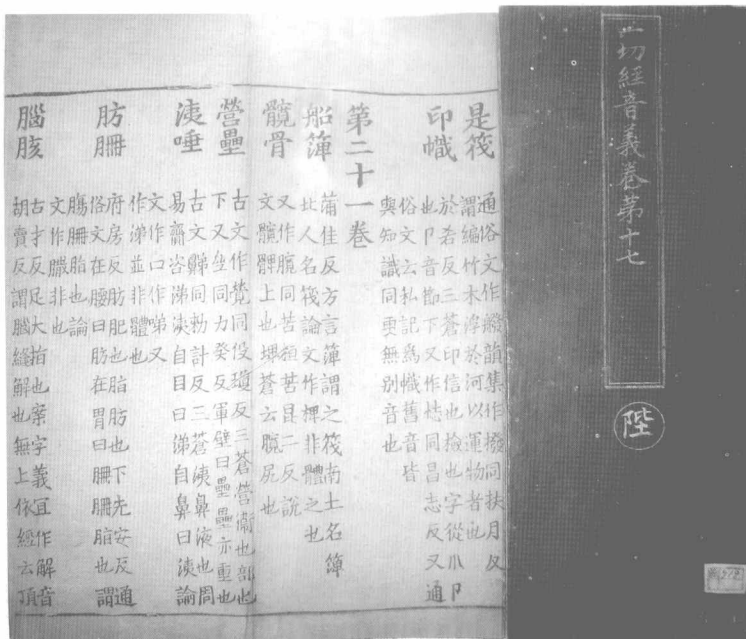
石山寺藏玄應《一切經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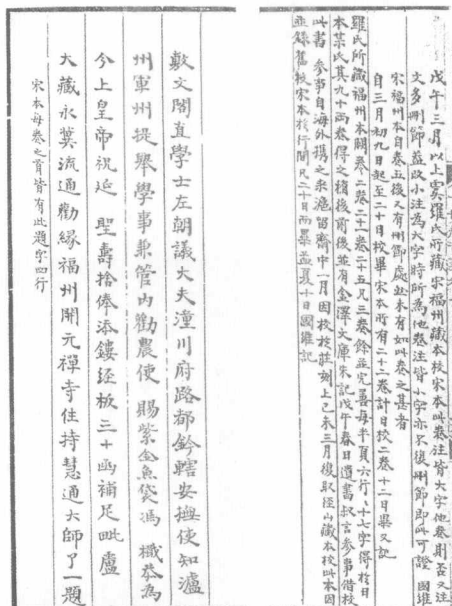
《中華大藏經》影印
金藏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國家圖書館藏金藏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崇甯萬壽大藏經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王國維校莊炘本玄應《一切經音義》

一切經音義
正編
(一)

台灣大通書局 印行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麗藏本慧琳《一切經音義》

唐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撰

天坊經商義

博桑雄東獅谷白蓮社藏版

大唐菜園

熱

[illegible]

謂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
觀末曆

[illegible]

國一說士摩伽星名此言不悉主
十二月也咆者震也名為不悉震

[illegible]

獅谷白蓮社本慧琳《一切經音義》



燕京崇仁續一切經音義十局
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其本傳在本山今新上木播之
海內印板置當院矣
大日本延高二年乙丑冬十一月
高野山北室院沙門堯昌謹誌

獅谷白蓮社本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延享三年丙寅三月日梓行

內州 交野郡 山田郷 万法藏院比丘行願顯明校訂

獅谷白蓮社藏

弘通所 三條通

藏版

一文那

寶刀匠宮匠之

續一切經音義卷第一 弁
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集
蓋聞殘純樸而薄道德仁義漸開廢結繩而定
著龜文字乃作仰觀玄象俯視成形蒼頡始制
於古文史籀纂成乎大篆相沿歷世更變隨時
篆與古文用之小異逮周禮保氏掌國子學以
道教之六書謂像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六者造字之本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
書並為謬惑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秦并海內丞

獅谷白蓮社本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序

在中國傳統語言學著作中，音義書是指解釋字詞的讀音和意義的書。大略言之，音義書又可分為以解釋儒家典籍為主和以解釋佛典為主兩大類。由於梵語、巴利語等和漢語的語言系統完全不同，所以始於東漢、持續千年之久的佛經翻譯，並不只是單純的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而是一種史無前例的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活動。佛經義理深奧，名相浩繁，在漢譯過程中產生了大量音譯和意譯的外來詞，其中包括許多為了表示當時中國沒有的思想、觀念而創製的新詞，使用現有詞彙時也出現了不少新義，特別是廣泛地運用了當時漢語的口語表現形式，這在詞彙、語法等方面都很明顯。為了使漢地的廣大信眾能更好地研習佛典，讓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更加順利，加上印度的聲明學（śābda-vidyā）和中國本土的訓詁學都有悠久的傳統，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系統解釋漢譯佛教詞語和一般詞語的佛經音義便應運而生了。

通常認為，北齊釋道慧所作一切經音義是最早的一切經音義，今已亡佚。現在廣為人知的唐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和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可以視為佛經音義的代表作品。遼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所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則是慧琳音義的續作和補充。這三部書在語言學、佛學、文獻學、歷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具有極高的使用和研究價值。

徐時儀教授曾與筆者同事數年，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就共同從事漢語大詞典的資料搜集和條目編纂工作。以後他進入上海師範大學學習和工作，多年來以頑強的毅力和為學術獻身的崇高精神，在古籍整理、漢語詞典編纂、漢語詞彙和漢語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各個方面都卓有建樹，寫出了多部篇幅巨大的專著，參與和主持了不少澤被後人的大型工具書的編寫，因而受到師友和學界同人的一致好評。而對佛經音義的探索，是他致力最多、成果最為豐碩、影響最為深遠的研究領域。

時儀兄從事佛經音義研究，至今已二十多年。一九八五年他撰寫了碩士論文慧琳和他的一切經音義，經修改補充，於一九九七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以後，他又在繁忙的教學、科研工作的同時，寫作博士論文玄應衆經音義研究，於二〇〇三年完成，二〇〇五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厚重的專著近六十萬字，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對該書的最全面、最徹底的研究，涉及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詞彙、語法和佛教、文化史等多門學科。此外，時儀兄還撰寫了數十篇關於玄應音義的專題論文陸續發表，對上述專著中各種問題作了更加深入的闡述。與此同時，他還與日本南山大學的梁曉虹女士和上海師大的陳五雲先生合作，寫出了通論性著作佛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等書，分別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刊行。二〇〇五年九月，由他倡議發起的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行，來自中國大陸各地和香港、臺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的二十多位學者出席會議，會議論文集佛經音義研究已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於二〇〇六年出版。

爲了替研究者和廣大讀者提供一個可以依據的佛經音義的整理本，時儀兄在做完上述各項工作之後，復以他二十多年搜集的資料和所作校勘及有關研究爲基礎，決定把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和希麟續音義三書進行精細點校，出一個全新的合刊本。此議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國內外許多專家的支持，時儀兄率領由其指導的博士、碩士組成的團隊，在近三年時間裏晝夜兼程，嘔心瀝血，終於在今年年底前將全書殺青。這無疑是佛經音義研究史上的空前盛舉，對佛學、文獻學、語言學研究而言都是大功德。時儀兄雖頗自謙，然其成就，定將長存世間，嘉惠來學，歸於不朽，則可以斷言也。

誠如時儀兄所說，就文獻的校勘與考證而言，和外典相比，佛經文獻不同版本之間存在大量異文，用字亦錯綜複雜，所以難度更大。玄應、慧琳和希麟的三部一切經音義詮釋佛經一千四百多部，徵引四部古籍數百種，校勘的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見的。時儀兄的開創性工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得益於長期的資料積累。這次點校以高麗藏本爲底本，搜集了現今所能見到的各種版本，充分吸取了前賢和時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得到日本學者的大力支持，利用了以前無從寓目的日本所藏古抄本，在此基礎上擇善而從，故能超過前人。其次，在工作初期制定了比較完善的點校體例，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改充實，從而使面對的各種難題得以穩妥處理，並且貫穿始終，保證了全書的點校質量。

時儀兄和他率領的團隊精誠合作，教學相長，終於如期完成了全書的校點，現梓行有日，徵序及於下走。不學如愚，何足以讚揚盛製。考慮再三，只能就時儀兄不計功利，不顧得失，數十年如一日，以忘我精神研治佛經音義之過程，簡略敘述如上，以告天下之讀是書者，並爲時儀兄賀。是爲序。

徐文堪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於上海漢語大詞典編纂處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緒論

一切經音義是漢文大藏經中解釋佛經中難讀難解字詞的音義類訓詁學著作。玄應所撰一切經音義是現存最早集釋衆經的佛經音義，又名衆經音義^{〔一〕}，簡稱玄應音義，共二十五卷。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是佛經音義的集大成之作，簡稱慧琳音義，共一百卷。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則對慧琳音義成書後新翻譯的佛經進行闡釋，簡稱希麟音義，十卷。這三部一切經音義雖「義附彼教，而訓釋華言，采獲所及，莫非古訓」^{〔二〕}，且摭拾甚廣，包孕彌富^{〔三〕}。其隸事運古，所存古義和佚書爲數頗多，誠小學之淵藪，藝林之鴻寶。其浩博無涯，洵足以俯視李善文選注和陸德明經典釋文。時隔千年，這三部一切經音義不僅是披讀校訂佛藏經典的音義典籍，而且還超越了佛儒的界限，涉及宗教、哲學、語言、文學、藝術、中外交往史等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爲中古小學著作的總結性彙編。僅就文獻學和語言學研究而言，這三部一切經音義多以當時人們所熟知的詞語來解釋佛經，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保存了更多的不爲其他典籍所載的活語言現象，且引用了大量漢唐文獻溯其淵源，保存了漢唐文獻和不少今已失傳的古籍的原貌。因而其所引用的漢唐典籍和佚書是古籍整理和輯佚的寶庫，辨析的異文俗體是研究文字學的寶庫，標注的異切方音是研究音韻學的寶庫，詮釋的方俗詞義是研究詞彙學的寶庫，成爲我國傳統古典文獻中的瑰寶，在文獻學、語言學和傳統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一切經音義編纂和時代背景

（一）佛教的傳播和佛典的翻譯

佛教自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東傳中土，經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而進入全盛時期。據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皇朝傳譯佛經錄第十八載，唐初「四海廓清，三寶云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四〕}太宗時有寺三千七百一十六^{〔五〕}，高宗時有寺四千，僧六萬餘人；玄宗時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萬零五百七十六^{〔六〕}。開元時令天下三歲一造僧籍，故其時有關史料所載僧尼人數當較可信，據新唐書辛替否傳稱，當時已有「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的說法^{〔七〕}。唐代的都城長安不僅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成爲中國佛教各宗並盛的重地。四方佛徒跋山涉水來到這裏譯經弘教，一時僧尼溢於三輔，寺塔遍於京城，「當時幾乎把國內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都集中到佛學界裏來」^{〔八〕}。阿彌陀佛普度衆生，人們只要念他的名號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能聞聲救苦，念他的名號就能水火不傷，超脫苦難；維摩詰居士不必出家當和尚即可「現身說法」；金剛經只要傳誦一「偈」，就有「無量功

德」。「幾百年之中，上至帝王公卿，學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婦，都受這新來宗教的震盪與蠱惑，風氣所趨，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國。」⁽⁴⁾佛教的盛行，上起帝王，下到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已不單是宗教問題，而是現實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對於當時的學術思想、文化生活無不產生極大的影響⁽⁵⁾。

佛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廣義地說，是人類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包括教徒組織、清規戒律、儀軌制度和情感體驗等內容。狹義地說，它就是佛所說的言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佛法。佛法的内容極為廣博深奧，體現了其獨特的宇宙觀。兩千多年來，佛教文化不斷適應中國的國情，無論在皇室，還是在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佛教文化已深深地滲透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之中，滲透進了中國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正如季羨林在我和佛教一文中所說：「對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和文化史、哲學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細緻、具體、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較正確的論斷。這一件工作，不管多麼艱巨，是遲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遲要好。否則，我們就無法寫什麼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再細分起來，更無法寫中國繪畫史、中國語言史、中國音韻學史……等等。」⁽⁶⁾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像佛教文化那樣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使人們的深層意識亦即文化的核心發生重大的變化。

佛法的内容涵蓋面極廣，佛教典籍作為佛教文化的直接載體，則記載了這些内容。我們所說的佛教典籍，特指相對於古代印度佛教原典而言的漢文佛典，包括漢譯佛經和中國佛教撰述兩大方面的内容。漢譯佛典的原語種十分繁雜，既包括從印度各俗語、梵語、巴利語翻譯的經典，也包括從中亞一帶各種語言翻譯的經典。佛經的翻譯始於東漢，至唐達到極盛。根據其内容分為經藏、律藏、論藏三藏。經藏是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種種說教的語錄彙編，保留了大量原始的基本教義，梵名「素怛纒」，又名「修多羅藏」，大致為小乘佛教阿含部和大乘佛教寶積、般若、華嚴、涅槃四部的内容等。律藏是釋迦牟尼為他的信徒所制定的種種行為規範，又稱戒律，梵名「毗奈耶」，又名「毗尼藏」。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和摩訶僧祇律等。論藏是佛弟子注釋和闡發經藏内容的著作，梵名「阿毗達磨」，又名「阿毗曇藏」。這部分的内容極為龐雜，包括佛教發展以後形成的各宗派闡述自己觀點的論著。此外還有「密部」，較為後起，與「顯教」相對，有其獨特的用語和儀軌，尤其是陀羅尼（即密咒）。

隨著佛教的發展，我國歷代的佛教徒也撰有一些佛學著作。這部分内容按照體裁可分為注疏、論著、語錄、史傳、音義、目錄等。其中注疏主要是疏通佛教經論的文義，形式多樣。或劃分段落，總結大意；或區分章節；或隨文疏解義理；或分門詮釋内容；或因師口授，筆記所得；或集前人注疏而成書等。論著為漢地佛教各宗派的理論著作，記述了佛教各宗派學者的獨特見解以及專就某些論題展開的討論。語錄為唐以後禪宗一派歷代法師的語錄體著作，也是漢文佛典中頗有特色的部分。史傳為佛教史地著述和人物傳記，有釋迦傳記，也有僧人傳記；有佛教史，也有教派史；有西域地志，也有漢地山寺塔記等等。音義分兩部分，一為解釋佛經字音、字義和字形的小學著作；一為用於翻譯佛經的梵漢雙語字典，如翻譯名義集等。經錄為歷代藏經目錄和佛典内容提要，著名的有綜理衆經目錄、三藏記集、歷代三寶記、大唐內典錄、開元錄等。此外還有一些佛學類書性質的纂集類著作以及筆記、護教文書、懺儀、願文等。

雜纂類著作。

佛教典籍隨着佛教在世界各國的傳播和發展，形成了各種不同文字的傳本。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景盧用當時的口語筆錄而成的浮屠經遂開漢譯佛經之先河^{〔110〕}。隨着西域僧衆東來傳教，中國僧衆西行求法，譯經日盛，最終形成了我國自成體系的漢文大藏經。漢文大藏經是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彙，在漢傳佛教地區，佛教典籍先後被稱爲「衆經」、「一切經」、「經藏」、「藏經」，後來則統稱爲「大藏經」。僅據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所收今存譯本統計，保留至今的漢文佛典約有一千四百餘部，五千七百餘卷。

漢文大藏經是與藏文大藏經、巴利語系大藏經相並列的現存三種主要佛教大藏經之一，也是我國古典文獻中的寶貴遺產之一。漢文大藏經有開寶、崇寧、毗盧、圓覺、資福、磧砂、普寧、契丹、趙城、高麗、嘉興、天台、弘教、頻伽、正和、大正藏等二十餘種。北宋太祖開寶五年（974）刻成的開寶藏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本大藏經，此後的刻本大致以其爲準據。圓覺藏爲北宋末年開雕的湖州思溪趙城圓覺禪院本，崇寧藏爲刻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的福州東禪院本，毗盧藏爲開雕於宋徽宗政和二年（1123）的福州開元寺本，資福藏爲南宋所刻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本，磧砂藏亦刻於南宋，全名爲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契丹藏又名遼藏，趙城藏又名金藏，普寧藏刻於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明代所刻則有永樂南藏和永樂北藏等，嘉興藏刻於明末清初，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開雕的清藏又名龍藏，頻伽藏爲民國初年以弘教藏爲底本的排印本。弘教藏爲日本弘教書院於明治十三年至十八年（1880—1885）以資福、普寧、高麗和嘉興藏相互對校的排印本，又名縮刷藏或校訂縮刻大藏經。正藏爲京都藏經書院於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編輯的排印本。這些大藏經中，1251年刻成的高麗藏再雕本以開寶藏本、高麗藏初雕本與契丹本互校，在古代刻本各藏中推爲精本。大正藏則是繼高麗藏後又一精本，爲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於大正十三年（1924）以高麗藏再雕本爲底本，以宋元明三藏和官本、敦煌寫本等補充校勘而成的排印本。1982年至1997年中華書局編纂出版的中華大藏經以開寶藏的複刻本趙城金藏爲底本，又以八種不同時代的具有校勘價值的版本作校本。其缺失部分則以高麗藏補足，並按照趙城金藏千字文編次的目錄體系，將歷代大藏經中有千字文編次的特有經論按照內容性質悉數補入，收錄經籍一千九百三十九種，一萬餘卷，集歷代刊刻大藏經之大成。此書不僅版本珍貴，而且校勘全面，可以說大致反映了歷代所刊大藏經的基本面貌，兼備了歷代諸藏之美。

（二）儒釋合流的總趨勢

唐代儒釋道並重。據舊唐書 陸德明傳載唐高祖曾親臨釋奠，一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111〕}唐代統治者對佛教基本上採取了扶持的態度。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宗曾召玄奘法師赴宮，玄奘爲其所譯瑜伽師地論請序，太宗欣然允諾，親爲撰寫大唐三藏聖教序，並命上官儀對群僚讀之。玄宗則不僅爲孝經作注，還爲金剛般若經作注^{〔112〕}。元和十三年（818），憲宗甚至「迎佛骨於鳳翔」^{〔113〕}。

唐高祖 李淵出身北周貴族，利用隋末天下大亂的時機，在太原起兵，打敗群雄，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唐初的統治者總結隋亡的前

車之鑒，深感受保持並鞏固自己的統治，就得對老百姓在政治、經濟等方面讓點步。唐太宗曾對大臣們說：「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安乂，此乃朕之甲兵也。」^{〔二五〕}佛教適應中國的國情，從小乘到大乘，一直發展到禪宗，宣揚生死輪回，當前的痛苦算不了什麼，佛國就在眼前，這對封建統治者是有利的。佛教還講涅槃佛性、成佛作祖、樂國淨土，這對統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正如唐李節錢潭州疏言禪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說：「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鬥，知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群起矣！」這段話一語中的地說明了統治者推崇扶持佛教的根本用意所在。統治者利用佛教，佛教則借助王權弘揚教義。據劉賓客嘉話錄載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卻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慧琳音義卷首首釋唐太宗所撰大唐三藏聖教序和高宗述三藏記，亦頗可說明佛教對王權的倚重。〕}佛教發展至唐代，在統治者的扶持和推崇下，已與儒、道鼎足而三。

任何一種外來文化，都要在同本國情況相適應的氣候條件下，才能得以植根、生長、演化。佛教能在中國傳播和發展，並成為中國上層建築的有機組成部分，也經歷了適應中國國情、不斷地中國化的過程，中國思想發展史證明，儒釋關係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歷了一個曲折複雜的演變過程。有時鬥爭，有時融合，然而總趨勢是佛教逐漸中國化，走向儒釋合流。南北朝時期一些佛教徒已有意識地融合附會儒釋二家的觀點，力主兩者之和合。

隋唐時期，隨着國家的重新統一，出現了許多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儒釋進一步合流，隋李士謙把三教比做：「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二七〕}唐初法琳在辯正論中稱釋迦牟尼是一個大孝子。華嚴宗五祖宗密（780—841）^{〔原人論亦稱：「佛且類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45/708c）並在孟蘭盆經疏序中宣揚孝道是「儒釋皆宗之」。^{〔39/565a〕}唐朝中後期，一些宣揚孝道的佛經也開始出現，強調孝是成佛的根本。這些都表明，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即佛教作為外來的宗教文化形態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成為適應中國國情的中國佛教。

儒釋融合的總趨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個方面：

1. 佛教教義逐漸適應儒家思想

佛祖告誡人們「諸惡莫作」，要求弟子「諸善奉行」，這是佛教的道德行為準則，是基於因果報應的原理而確定的。無論是小乘佛教提倡的通過個人的修持來求得個人的解脫，還是大乘佛教自利利他、佛果圓滿，乃至救苦救難、普度衆生的目標，其本均源於此。^{〔三〕}吳康僧會所譯六度集經中已以儒、道思想來融合佛說，體現了儒家的「仁道」、「孝道」等思想。西晉竺法護所譯孟蘭盆經主要敘述目連根據佛陀的指示，敬設盂蘭盆供救度母親的故事。這與中華民族提倡的仁慈孝道的倫理傳統十分契合，所以此經譯出後，頗為流行，影響很大，不僅由此興起了延綿至今的盂蘭盆會，而且有關目連的故事也被改造成小說，編成戲劇，為人們所喜聞樂道。隨着佛教從小乘到大乘，由禪宗到淨土宗，儒釋也一步一步合流，佛教文化最終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 藉華言以傳的佛經翻譯

佛經翻譯始自東漢的安世高，終至北宋末年，近十個世紀，譯出的經、律、論三藏凡一千六百九十餘部，六千四百二十餘卷。印度佛教的大小乘之經、律、論三藏幾乎全部被譯成漢文。這些佛典大部分譯自梵文，部分譯自印度西北部的佉留文、南部的巴利語（Pali）和印度北部的一種健陀羅語以及西域某些語言。這些譯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新鮮血液，從量到質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梵文系統的佛經譯成漢文，實質上也是一種佛教中國化和儒釋合流的過程。道宣玄應音義序說：「然則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隨俗言悟，釋父之流慈。非相無以引心，非聲無以通解。」智光龍龜手鏡序指出：「矧複釋氏之教演於印度，譯布支那。轉梵從唐，雖匪差於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於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准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啓以隨函。」黃子高一切經音義跋也認為：「顧西域有音聲而無文字，必藉華言以傳，隨義立名，故不得不借儒術以自釋。」唐代浮屠多通經史，又去古未遠，授受皆有師承。」^①佛經漢譯規模之大，氣勢之盛，歷時之久，人數之衆，成果之宏，堪稱中外文化交流的偉業之一，也是世界翻譯史上彪炳千古的豐碑。梵文系統佛經中的概念名詞雖源自西天佛國，但當它被譯為漢語時，可以說已經融入了兩者兼有的文化內涵。

佛教是作為一個完全不同質素的語言和文化系統傳進中國來的，它向人們展示的是一個嶄新的異域文化景象，有許多佛教特有的名詞概念，在漢語裏沒有恰當的同義詞，所以魏晉玄佛合流之始，人們曾採用「格義」的方法，即用中國古代老莊哲學中的某些術語範疇來擬配佛經中的一些術語範疇。如用「無」來表示佛家重要的「空」理；把「涅槃」稱作「無爲」；用「道」對譯「Bodhi」（菩提）等，一些老莊哲學名詞曾一度而為佛家語所用，從中亦可看出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

3. 借儒術以自釋的佛經著述

如果說將梵文系統的佛經譯成漢語，此舉本身就是佛教中國化和儒釋合流的一種體現的話，那麼從東晉道安開始的注釋佛經，就更是進一步借取了傳統小學的工具為佛經的傳播服務。

佛經翻譯至東晉，數量已相當可觀，然而舊譯的經文，往往多有訛謬，索解不易，而講說佛經者，又每每僅叙其大意。於是道安在組織譯場、主持譯經的同時，考校譯本，詮解文義，注釋了二十餘卷佛經。僧祐在出三藏記集卷十五贊其「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55/108a）此後遂出現了一大批佛典注疏著作，成為中國佛典的重要部分。

大乘佛教主張普度衆生，所以總是儘量地爭取群眾。中國的高僧大德為了弘傳佛法，不僅僅是翻譯，撰寫了許多經典，還為佛經作了許多注疏，做了許多普及工作。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佛教經典的注疏有大乘經疏三百七十九卷、小乘律講疏二十三卷、大乘論疏四十七卷、小乘論講疏七十六卷、雜說講疏一百三十八卷。凡較為重要的經典幾乎都有注疏，有的甚至數注數疏。當時不僅僅是僧人積極從事經義的講解，連皇帝都很重視。如南朝的梁武帝、梁簡文帝都曾親自參加講經的活動，一些講經的稿子成為後來的講疏、

義疏。

魏晉時期，道家變成了玄學家，崇尚清談，佛家自也不甘落後，更加重視講經等宣傳普及活動，編寫出大量的義疏、講疏來。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指出隋唐的義疏之學，實與佛典疏鈔之學同時發生，吾固不敢徑指此為翻譯文學之產物，然最少必有相互之影響，則可斷言也。莊旰一切經音義序也指出：「釋氏有音無字，非借吾儒詁訓無以闡揚其教，故有唐沙門類多通曉儒術。」由此可見佛典注疏與我國傳統訓詁學的密切關係，佛經在翻譯過程中，已經邁出了中國化和儒釋合流的第一步，即「藉華言以傳」和「借儒術以自釋」，傳統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在佛典的注疏中很自然地融入了佛典中。

(三) 一切經音義的淵源

儒釋合流不僅體現在注釋佛經一方面，還體現在運用興盛於魏晉的音義為釋經服務上。「音義」本是古書注釋的一種形式，也是傳統訓詁學中的一個術語。「音」為辨析字音，「義」為詮釋詞義，「音義」即注音以釋義，以「音義」為名的書即「專指解釋字的讀音和意義的書」。古人為通讀某一部書而摘舉其中的單字或單詞而注出其讀音和字義，這是中國古書中特有的一種體制。^{〔九〕}這類辨音釋義的書是通過注音和辨音來釋義的，往往以注音和辨音作為訓解闡發詞義的手段，主要特徵是注音和辨音，故又可稱「音訓」，如服虔的漢書音訓，稱「音詁」，如楊慎的周官音詁，稱「音注」，如薛虔的周易音注，稱「音釋」，如羅復的詩集傳音釋，稱「音解」，如許翰的太玄經音解，稱「音證」，如劉方的毛詩音證，稱「音隱」，如服虔的春秋音隱，稱「注音」，如陸德明周易注音等，有時還可省稱為「音」，如徐邈的毛詩音等。

據清謝啟昆小學考載，音義著作有二百六十八部，又據陽海清等編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載，音義著作有一千一百一十部。^{〔一〇〕}最早的音義著作是漢末魏初孫炎所撰的爾雅注和爾雅音，顏之推將其合稱為爾雅音義。其後此類著作頗為流行一時，且由於師承不同而往往有好幾家為同一部書注音釋義，如為毛詩辨音析義的有鄭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徐爰等諸家，為禮記辨音析義的有射慈、謝慎、孫毓、繆炳、曹毗、尹毅、沈重、徐爰等諸家。根據經典釋文序錄及隋書經籍志所載篇目，大致有如下兩類，一類單稱「音」。如孔安國尚書音、鄭玄尚書音、毛詩音、三禮音、服虔春秋左氏音、王肅易音、毛詩音、三禮音、高貴鄉公曹髦春秋左氏傳音、孫炎爾雅音、嵇康春秋左氏傳音、司馬彪莊子音、郭璞爾雅音、山海經音、李軌易音、尚書音、毛詩音、三禮音、春秋左氏傳音、春秋公羊傳音、莊子音、二京賦音、范宣儀禮音、禮記音、劉昌宗三禮音、徐邈易音、尚書音、毛詩音、周禮音、禮記音、春秋左氏傳音、論語音、莊子音、諸詮之百賦音、陳國武司馬相如賦音、鄒誕生史記音、施乾爾雅音、謝嶠爾雅音、顧野王爾雅音、戚袞周禮音、蕭該文選音、包愷漢書音、佚名三蒼音、證俗音、史漢音等。一類則稱音義或音訓等。如服虔春秋音隱、應劭漢書音義、韋昭漢書音義、徐廣史記音義、臣瓚漢書集解音義、阮孝緒正史刪繁音義、臧兢範漢音訓、沈重毛詩音義、蕭該漢書音義、延篤戰國策音義、史記音義、宋衷史記音隱、柳詒史記音解、劉芳毛詩箋音證、于氏毛詩音隱、謝氏禮記音義隱、佚名說文音隱、字林音隱等。這些書今多不存，據清謝啟昆小學考考定尚存四十三部。